

摩天岭战役——红军长征进入甘肃第一战

● 郭雄

位于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交界处的摩天岭，是甘肃文县与四川青川县的分水岭。山因史而著名，史因山而增辉。三国时期，邓艾伐蜀偷渡阴平，翻越摩天岭，一举灭蜀，摩天岭从此蜚声中外。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激战摩天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长征途中进入甘肃省的第一支队伍，也是红军长征途中进入甘肃陇南境内的第一支队伍。红四方面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一支劲旅。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连续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后，冲破敌人重重包围，转战到陕西南部的城固，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这里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春夏之际，红四方面军已由入川时的1万7千余人发展到8万余人，根据地面积达到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000多万。川陕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红色革命根据地。

1935年4月上旬，担任西北路主攻任务的红三十军、三十一军抵达川甘边界的四川省青川县一带，开始发起“摩天岭战役”。准备北进文县，进而攻占天水，夺取甘肃南部，实施创建川陕甘新苏区计划。红四方面军在青川县蒿溪镇拱北设立了作战指挥部，徐向前亲自指挥。

首战五龙山

五龙山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沙州镇（即白水关下古白水县）南侧，山势突兀高耸，位于川、甘、陕三省结合部，是青川县东北之屏障，白龙江之咽喉，是进入甘肃南部必经的要道，古称白水关。胡宗南部丁德隆旅常派一连兵力驻守沙州中街，并调遣了以陈胡峰为首的平武民团30余人驻沙州南坝，以曹子太为首的广元民团30余人驻沙州下街，另有川军邓锡侯部一个团驻扎在白龙江北岸曹坪村。

1935年4月6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先遣队，从茶坝经天垭赶到了沙州附近的龙坝嘴，占据了街头制高点五龙山。第二天，敌军企图偷袭五龙山。红军指战员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反扑，在战斗中歼敌百余人。五龙山一战，是摩天岭战役前的一次重要的战斗，这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为红军长征进入川甘边境地区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平台山之战

平台山，海拔1800多米，位于甘肃文县中庙乡境，与文县碧口镇、青川县沙州镇毗邻，山高地险，是青川县通往甘肃南部重镇碧口的天然门户。

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攻克五龙山之后，4月11日，在青川县沙州分兵两路向平台山顶逼进：一路经狮子梁、桦坪岭、石圈子、寒坡垭等地进入平台山；一路经严家院、碱家湾、上岩山、三包口进入平台山。与此同时，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也从昭化县宝轮镇（今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翻越白龙江西岸的高山，由广元县罗家坝，经截刀梁、茶园，进入青川县茶坝、骑马，到达沙州，直奔平台山，协助二七一团作战。

驻守文县碧口镇的敌丁德隆部得知红军占领平台山并向碧口进攻的消息，慌忙调遣兵力和碧口镇民团头目赵子厚的200余团丁，于4月17日，分三路向平台山祖师庙红军营部进攻。

4月18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和红九军一部奉命增援平台山。在敌众我寡、武器落后、弹药缺乏的情况下，战士们坚持战斗了18天，胜利完成了阻敌任务。4月28日，红四方面军奉命西进。坚守平台山的红军当晚全部撤离战场。

血战悬马关

悬马关，地处川甘交界的文县碧口镇李子坝的北部边缘，地势险要，道路崎岖。关口两面为悬崖绝壁，中间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自古以来是甘肃南部的武都县、文县通往四川平武县、江油县等地的交通要道。

1935年4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十二师二六八、二六九团由江油县青林口进入凉水，途经青川分县（现为青川县）的关庄坝、古城沟、永安寺到达岷溪，攻占青川分县，青溪古城（原青川分县县城）。第二天下午赶至青川县和文县交界处的黄土梁，红军集结了3个团的兵力于黄土梁至悬马关一带（相距约20公里），准备向驻守碧口的胡宗南部丁德隆独立旅发动进攻。悬马关一失，碧口无险可守。敌丁德隆向胡宗南告急，胡宗南亲驻碧口镇督战，并招收了一个土匪、地主混合的地方民团为别动队，在悬马关一带同红军展开争夺战。

4月12日，国民党第六十师的3个团开往悬马关附近的大刀岭一带，并于当晚派1连兵力在九道拐偷袭红军，激战十多天后，红军粉碎了敌军第六十师的多次进攻。

激战摩天岭

摩天岭又名青塘岭，为甘川交界处的一座著名山岭，海拔2227米，关口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两端多系悬崖绝壁，自古以来就是甘肃文县通往四川平武、江油等地的交通要塞。阴平古道就通过于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史载，魏景元四年（263年），魏大将邓艾奉命攻蜀，出奇兵走文县，越摩天岭（又称青塘岭），偷袭江油关，蜀汉守关将领马邈不战而出降献关。邓艾最后攻入成都，后主刘禅自缚投降，蜀国灭亡。

1935年4月10日，红三十军由江油县青林口进入青川县境内，经凉水、关庄、古城到达青溪城（原青川县城），立即派出一支部队经关庄抢占川甘交界的自古战略高山险地——摩天岭。4月11日凌晨，红军指挥部发出了进军摩天岭的命令。二六三、二六八、二七六团3个团的红军战士行程40多公里，于当天下午赶到了摩天岭山脚下的蒲家院。

胡宗南深惧红军大部队突破摩天岭而进入甘肃南部，电令驻守四川松潘的四十九师伍成仁部从西面向摩天岭逼近，另增调2个旅的兵力，在通往文县沿途的怀抱树、沙坝里、梁家坝、石磨河、九洋坝等地设防。

战斗激烈地进行了18天，敌我双方都有较大伤亡。红军根据战斗情况判断：从摩天岭进入甘肃南部已不现实。为保障红军顺利撤离摩天岭战场，红军指挥部派二六七团增援摩天岭。

“摩天岭战役”东、西战场近百华里，双方投入兵力30个团，数万兵力，战斗十分激烈。摩天岭一带山大沟深，地形险要，红军后因给养不足，弹药缺乏，在持续战斗近20天后主动撤离战场。4月28日，红军奉命全部撤出战斗，转移到四川平武、江油县境内。

此次战役后，国民党军重兵集结陇南全力围堵，红四方面军遂改变北上战役计划，继续向西转移。1935年6月12日，三十军李先念部率领八十八师及九军一部占懋功，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省小金县城东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胜利会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全运会

● 郑学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大力提倡军民因陋就简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炼就钢铁般的筋骨，增强综合素质，以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红军各军团、苏区政府机关和各团体热烈响应，经常组织体育竞赛活动。为全面检阅和促进苏区体育运动的发展，纪念五卅运动八周年，1933年5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于5月30日举办中央苏区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并为此专门成立了运动筹备会。《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第一版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筹备会5月5日发出的通知：“在争取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时，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是非常必需的。因此，决定于五卅在赤色首都举行全苏区运动会，向敌人作总示威，要求各苏区于25日前派选手热烈出席（伙食自备）比赛。”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特地为之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

1933年5月30日下午6点，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举行开幕式，驻瑞金的各机关、部队和群众代表近万人参加了开幕式，推举了运动会主席团、总评判主任和总裁判。

6月1日比赛正式开始。比赛项目共有18项，其中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田径项目有跳高、跳远、撑杆跳、三级跳、铁球、铁饼、标枪、越障，以及50米、100米、200米、400米赛跑。《红色中华》1933年6月4日第四版报道说，早晨5点30分，160名运动员全部集合在运动场，他们有来自前方红一、三、五军团的代表，红军学校学员，中央政府机关干部，江西、福建各县市选派的运动员。“当时虽天空阴云密布，小雨纷纷，然仍个个抖擞着自己的精神。未几银角一吹，比赛开始，这一天全是球类竞赛，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全场是球。顺次比赛，一军团、红校队，中央政府队，国家保卫局队，江西队，身强力壮，跳跃敏捷，特别是少共中央局队在篮球比赛时，竟以33比1大败江西队，20比0使保卫局队吃了一个鸭蛋，同时红校的足球队亦颇不弱，以2比0战胜江西队。一直赛至午12点钟方暂时休息。”下午2时，又进行了室内乒乓球比赛。中央政府队选手所向无敌，连胜第五军团和保卫局队，取得决赛权。

6月2日，举行决赛，少共中央局获得篮球、网球和乒乓球的冠军，保卫局获得田径赛冠军，红校获得足球冠军。

6月3日下午，又举行了各种球类的友谊赛后，中革军委招待了全体参赛选手，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运动委员会，经民主推荐，以项英、王盛荣、邓发、张爱萍、施晨晨等5人为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主管全国性体育运动的组织机构。晚上，举行闭幕式，评判主任为运动员颁发奖状和奖品，工农剧社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运动会在热烈喜庆的气氛中圆满落幕。

藏品上的植树情结

● 胡萍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我国很早就有清明时节插柳植树的传统。植树活动首次正式成为法定节日是在1915年7月31日，北洋政府规定此后每年农历清明日为植树节，并举行植树节仪式。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他逝世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原来的清明植树节即告废止。



图二

绿化祖国多植树宣传画（图一），该画的作者为郭华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画面中，两名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并肩站立，右边扛树苗的女青年身着粉红色毛衣，灰色长裤。她身材苗条，面目清秀，微侧着脸庞，脸上的笑容比身后的桃花还美。左边身穿桔红色针织衫、梳着小辫的女青年，肩扛铁锹，目视前方。这幅宣传画色泽艳丽流畅，人物栩栩如生。其“绿化祖国多植树”的主题至今仍不过时，观之能激发人们植树造林的热情。

植树粉彩小碗（图二），这只粉

彩小碗制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碗的正面有图案，画面中，青山如黛，树木葱茏，春光灿烂。两名少年正在认真地植树。女孩蹲在地上培土，男孩站在旁边扶树苗。在他们身边，横放着一把铁锹，图案的左上角写有“绿化”两个字。碗底有标识“中国景德镇”5个字，表明这只碗的产地是景德镇。该碗小巧精致，釉质光洁细腻，画面色彩搭配和谐一致，清新自然，展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

植树节彩绘大瓷盘（图三），瓷盘绿意盎然，盘中心圆圈内的白底上绘着5棵大树，寓意“森林”，树下有“中国植树节”“3.12”的字样，表明这只瓷盘是为纪念植树节而作。圆圈外，淡绿色的底子上由内向外有三层纹饰，最里面一层是如意纹，中间满绘缠枝纹，上面点缀着菊花和彩蝶，最外面那层是浅绿和深绿错落排列的树木。盘子外壁的绿底上绘有如意纹、菊花纹和缠枝纹，盘底



图三



图一

中间的白底上写有“首都绿化委员会奖”“1990”字样，表明了这只瓷盘的用途和制作时间。该瓷盘色彩艳丽，设计精巧，器型规整，花纹繁而不乱，确为工艺佳品。

在首都北京中央档案馆，保留着一份珍贵的《蒙古农民》期刊创刊号原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少数民族期刊。

《蒙古农民》创办于1925年蒙古族青年们在蒙藏学校就读时期，由多松年负责主笔，乌兰夫负责约稿、编辑，奎璧负责排版、印刷、订订和发行工作。

1923年9月，多松年、乌兰夫、吉雅泰、奎璧等30多名蒙古族进步青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为培养这批有生力量，中共北京区委派何孟雄、朱务善、黄日葵等人轮流深入学校，向他们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斗争，才是民族解放的根本出路。

1924年10月，“蒙藏学校”13位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指导下建起党支部，多松年任支部书记。1925年2月，负责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编务的李大钊，深感“蒙藏学校”党支部需要一个指导工作、宣传发动、鼓舞斗志的舆论阵地，便指示多松年负责创办一份党的少数民族期刊。

多松年接受任务后即前往察哈尔、绥远等地，深入农牧民聚居区调查、采访，并写下两大本采访笔记。一个多月后他回到北京，与党支部同志一起商议，定刊名为《蒙古农民》，开始拟定内容、赶写稿件、设计排版，很快做出了《创刊号》。

《创刊号》栏目有：“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等，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置身处地的实例，讲述蒙古族同胞的苦难现状，揭露军阀王公的凶狠残暴，旗帜鲜明地呼吁要翻身解放，就必须奋起反抗、团结斗争。多松年在《发刊词》中说：“蒙古族农牧民必须改变三个坏命运：军阀压迫剥削、王公专制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创刊号》

的“卷首语”只有15个字，简洁有力、直击要害：“农牧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创刊号》还载有民歌、漫画等，比如把“外力、军阀、王公、租税”画成压在农牧民身上四块大石头；歌谣《蒙古曲》写道：“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不倒哭断肠！”

李大钊看到《创刊号》样本赞扬道：“松年同志，想不到搞得这样漂亮，完全像一个老手办的，辛苦，辛苦！”

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少数民族期刊《蒙古农民》在北京出版，刊名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64开，每期15页，与《新青年》《向导》等革命报刊一同发行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它旗帜鲜明，通俗易懂，体裁多样，有幽默讽刺的漫画，有简明扼要的政论，更有催人泪下的故事，深受蒙古族群众欢迎。封面上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每份铜元两枚，农人半价。

《蒙古农民》不但有效地传播了革命道理，指导少数民族同胞奋起斗争，还为党培养、锻炼出了一批素质高、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干部，参与编撰《蒙古农民》的多松年、乌兰夫、奎璧、佛鼎等人先后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党校（蒙古）、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成为我党少数民族民族工作的优秀领导人。

《蒙古农民》诞生于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中，虽然只出了几期，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仍在宣传影响广大蒙汉进步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产生了重要作用。载入内蒙古革命史册的归绥各族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运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工农兵同盟的相继成立、震惊全国的“孤魂滩事件”，无疑与《蒙古农民》的宣传、教育、引导有关。

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少数民族期刊《蒙古农民》

● 安杰